

张煦侯 著

通鑑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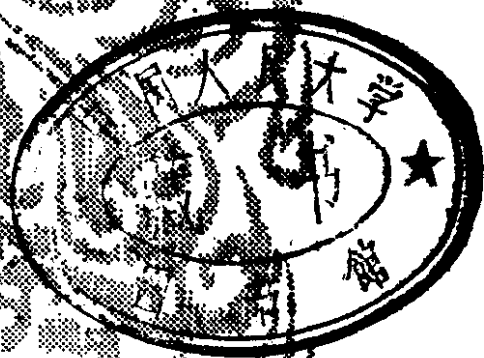


11(4)/7
986726



RD07/14

安徽人民出版社
张煦侯 著



学 鉴 通

(修 订 本)

责任编辑：张雪芹

封面设计：肖 英

通 鉴 学

张煦侯 著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625 字数：114,000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

统一书号：11102·32 定价：0.77元

出版说明

《通鉴学》是一本研究我国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的专著，一九四八年开明书店曾经出版过。一九五七年作者打算再版，撰就《重版自序》，增补了初版时所未摭入的有关司马光的资料，但未能如愿。此次我们即根据作者原修订稿再版的。

张煦侯先生(1895—1968)名须，江苏淮阴市人，一生从事教学工作，对史学颇有研究，他除本书外，尚著有《国史通略》《通志总序笺》《王家营志》等书及不少文史论文，是我国史学界的一位名家。《通鉴学》是他的重要著作之一，成书虽在解放以前，限于作者当时认识，有些见解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外，但对《资治通鉴》及作者的谨严的治史态度的揭示，仍不失为一本史学工作者和有志于史学工作的青年阅读的好书。

再版自序

一

《通鉴学》是我在抗日战争期间，避难于淮北苏皖边区洪泽湖东岸，距敌人前哨不过十二华里的一个村子里，就行笥中仅有的材料，在避兵和把笔的两种极难统一的矛盾情况下写出来的。对《资治通鉴》尝试性地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和分析，一九四六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的认识只能到此为止。

现在《通鉴学》要再版，事隔多年，对《资治通鉴》及其作者的看法，就不可能停留在旧有的水平上，这次我作了重点的修订。而对《资治通鉴》及司马光的生平凡初版未摭入的有关资料，只好增补在这《再版自序》中了。

二

司马光一生的事迹，具载《宋史》第三百三十六卷本传中。根据传中资料推算，其生年应为一〇一九年，即宋真宗天禧三年；其卒年则为一〇八六年，即宋哲宗元祐元年。他生在真宗时，中进士甲科在仁宗时，知谏院，为谏官也在仁宗时。仁宗的最后一年（嘉祐八年），司马光四十五岁，他还在做谏官，所进言于仁宗的，只是早建储嗣一

件事，这和北宋王朝的根本国策并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好读书，服御俭素如儒者”的英宗赵曙因此得立，因而对司马光的著作生涯就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司马光的著作生涯和政治生涯的乘除消长，也就要从英宗朝说起。

英宗是重视司马光的道德和学问的，在一〇六五年即治平二年，司马光由谏官改任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这正说明英宗要把他置之左右。到明年即治平三年，司马光四十八岁，就在这年四月受了新知遇，叫他編集《历代君臣事迹》。司马光奏道：“顷臣以战国时八卷上进，幸蒙赐览。今所奉诏旨，未审令臣续成此书，或别有編集？”英宗批答的话是“按所进八卷編集”。司马光少好左氏，他发愿写这部大书，在仁宗嘉祐年间就和他的得意门生，也就是在皇祐初年以经义考列冠军的刘恕率直地谈过这件心事。奉敕編集，在司马光不能不说是交了好运，我们决不能以后来政治生涯的不得意，来否定这件事的确为得意。

英宗死在治平四年正月，接帝位的神宗赵顼又是一个聪明的读书种子，就在这年三月提升司马光为翰林学士，到十月，就将这部《历代君臣事迹》赐名叫《资治通鉴》。这年还是十九年著书的开始，神宗就为他撰好序文，并于十月初九日，第一次在迺英阁进读的时候当面赐给他，令他“候书成后写入”，而“闻卿进读，终日忘倦”的话，也分明载在毕氏《续资治通鉴》的熙宁元年（一〇六八）卷中。偏巧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初四日，神宗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一席话打中了求治心切的少年君主的

心坎，到一〇六九年即熙宁二年，神宗就让王安石做了副相(参知政事)。这时候，神宗所以重用王安石，据《续资治通鉴》熙宁二年神宗对唐介和对王安石的谈话中，可以知道是由于王安石有文学、经术而兼通“世务”，这和优礼司马光的动机，大体是相同的，所差只在“世务”这一点。所以在一〇七〇年也就是熙宁三年王安石一度求去的时候，还要司马光做枢密副使。但司马光的态度很坚决，他始终强调祖宗法度不可改变，新法只能生事扰民，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保守主义者，结果，司马光六上札子，固辞不拜，神宗只有听他不做翰林学士，而让他到现在的西安做永兴军安抚使去。这一去，就和宋神宗邈若山河，但他还有对新法提出不同意见的奏章。到一〇七一年也就是熙宁四年四月，司马光索性向神宗请准，卸去地方长官的职守，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这本是无事可做的冗官。从此，他对“世务”不发言了。到元丰五年九月，司马光又受敕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这更是“坐享俸给，全无所掌”(《乞西京留台状》中语)的冗官，道地的冗官。

这样，入洛以后的司马光，论政治生涯似乎是很不得意了，可是论著作生涯，司马光正是事称其心，用当其才。一个曾做“迂书”，自称“迂叟”，和邵雍、吕海、范镇等人做朋友，永远不相信“道”为“变”的人，你叫他秉钧当国，在政治舞台上能做些什么事？相反，司马光居洛十五年，不但经营小筑，做“独乐园”的主人，不但追陪前辈，做“耆英会”的伙伴，到他六十六岁，也就是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年)，一部空前大书《资治通鉴》写出来了。

我们决不能说宋神宗对司马光用之未尽。看下面的记载，宋神宗正是司马光的知己，他始终爱重司马光：

其即位之初也，独以颖邸旧书赐司马光。逮光不愿拜枢臣之命而归洛阳，修资治通鉴，随其所进，命经筵读之，其读将尽而所进未至，即诏趋之。熙宁中，初尚溜石砚，乃躬择其尤者赐光。其书成赐带，乃如辅臣品数赐之。尝因蒲宗孟论人才，乃及光曰：“未论别，只辞枢密一节，自朕即位来，惟见此一人。”（邵博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四）元丰末，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成，进御。丞相王珪蔡确见上，问何如。上曰：“当略降出，不可久留。”又咨叹曰：“贤于荀悦汉纪远矣！”罢朝，中使以其书至政事，每叶缝合以睿思殿宝章。睿思殿，上禁中观书之地也。舍人王震等在省中，从丞相来观，丞相笑曰：“君无近禁裔！”以言上所爱重者。（同上书，卷二十一）

看神宗在《通鉴》进御之后，特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有人说神宗确有复用之意，不为无因。这是元丰七年十二月的事。

到元丰八年三月，神宗死了，十岁的哲宗赵煦在祖母高太后听政期间，做名义上的皇帝，司马光就在这年五月被起用为门下侍郎。到明年即元祐元年，司马光又被任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一时新党纷纷贬窜，旧党纷纷进用，保守派大获全胜。司马光就在这个期间，以六十八岁高年做了八个月的首相，好比绚烂的夕阳，所设施的至多

仅能让那些被打击的旧党官僚吐一吐气，老实说，于宋朝的国计民生是很少贡献的。幸而司马光死在高太后未死的时候，获得身名俱泰的哀荣。如果迟死八年，亲政后的哲宗改元“绍圣”，换来了章惇、蔡卞一班人，他们恨司马光，甚至要发冢、斫棺、暴尸而后快。这时候，作为党魁的司马光，其晚景就很难说了。

所以，司马光晚年出山，在他诚然是“尊其所闻，行其所知”，但其实是大可不必的，也是于事无补的。然而，宋朝士大夫都十分钦佩司马光的为人，就到党祸大兴的时候，总还有人为司马光说好话。别的不谈，《资治通鉴》的不曾毁板，就深赖太学博士陈瓘的一言。周辉叙述这件事很详细：

了斋陈莹中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兢尊王荆公而排挤元祐，禁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陈闻之，因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训。于是林自骇异，谓陈曰：“此岂神宗亲制耶？”陈曰：“谁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陈曰：“圣人之学，得于天性，有始有卒，岂有少长之异乎？”自辞屈愧叹，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学中敝高阁，不敢复议毁矣。（清波杂志）

这段故事，足以说明司马光得人拥护，也足以说明《资治通鉴》深得神宗的助力。神宗这篇“御制序”，据叶梦得说是王珪代做的（见本书第二章），这个姑且不论。但这序做得实在好。从消极方面说，他并没有一句空话；

从积极方面说，他发挥《资治通鉴》的内容非常深透，足以证明司马光这书，主要的是为帝王而作的。宋神宗爱重其书，并非空言。一直到司马光死后，这篇序还有庇佑他的力量。

三

司马光不独一手写成《资治通鉴》，又写成和《资治通鉴》有关的几种辅助读物。他在著作过程中的笃实和精勤，永远是学人的模范。

《资治通鉴》是个人独修的呢？还是集体合作的呢？换句话说，它是成于一手还是成于众手？这个问题不能看得太简单。它实在是先以在个人指导下的集体合作做成粗的坯子，再以个人独修来完成精的成品。因此，司马光是全书的负责人，书的美恶和由美恶得来的毁誉，皆应由司马光一人承受。助修诸人的任务只在“采摭异闻，勒成长编”。司马光曾有一封书给范祖禹，谈助修者应先写“事目”继修“长编”的工作程序，也颇谈一点采摭标准，是研究通鉴成书始末的有益资料。初版《通鉴学》在第二章中只节钞数语，不曾全录。现在补录在下面，以明司马光对这部大书的奠基工程是极其周致极其坚实的，也是极有创造性的。全书如下：

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

梦得今来所作丛目，方是将实录事目标出，其实录中应移在前后者，必已注于逐事下讫。（原注一）自旧唐书以下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长编也？请且将

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及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原注二）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原注三）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原注四）尝见道原云：“只此已是千余卷书，日看一两卷，亦须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毕，然后请从高祖初起兵修长编，至哀帝禅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禅位以后事，于今来所看书中间见者，亦请令书吏别用草纸录出，每一事中间空一行许素纸，以备剪开粘缀故也。隋以前者与贡父，以后者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盖缘二君更不看此书，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后天祐以前，则此等事尽成遗弃也。二君所看书中有唐事，亦当纳足下处修入长编耳。其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志纪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原注五）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假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称隋义宁三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称景云三年。梁开平

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也。诗赋等如止为文章，诏诰等若止为除官，及妖异止于怪诞，诙谐止于取笑之类，便请直删不妨。或诗赋有所讥讽，诏诰有所戒谕，妖异有所儆戒、诙谐有所补益，（此四者皆有原注）并告存之。大抵长编宁失之繁，毋失之略，千万切祷切祷。今寄道原所修广本两卷去，恐要见式样故也。

以上仅仅是写给范祖禹的一封信。文中原有自注数处，今从省不抄。此外对刘攽、刘恕，当然也有统一的指挥。照信中所云，做司马光的助手也颇不易，书要看得多，又要注得细，对占有材料也要有初步的抉择力，还要有“错综铨次”的组织力。无怪乎胡三省序文说他们“皆天下选也”了。

至于司马光自己所以应推为全书的负责人，其故由于全书的规划完全是司马光的规划。他不但规划本书，他还独创地撰写出三部书，做《资治通鉴》的卫星。我们可以推论这三颗“卫星”对通鉴有若何的拱卫作用：

第一部书是《通鉴考异》，胡氏所谓“参订群书之异同俾归于一”的。司马光没有开出参考书目，高似孙《纬略》仅说除正史外凡二百二十二家，但并没有一一举出书名。赖有《通鉴考异》，得以知道一些梗概。司马光这样做，至少有两种好处：第一是所引史外异说，凿凿有据，足以增加可信的程度；第二是《通鉴考异》中的“存疑”和“兼存或说”，能予后人以续加推究的资料。后一种更有价值。心地不光明而著书好武断的人是未必肯这样做的。

胡三省注文纠正《通鉴》错误，不一而足。有就《考异》所云加以辨正的，有某事本无考异而胡氏找出来历加以驳难的，现在避繁不备引。

第二部书是《通鉴目录》，胡氏在序文中尤加推重。他说：“《目录》三十卷，年经国纬，不特使诸国事杂然并录者粲然有别已也，前代历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实著于《目录》上方，是岂可以凡书目录观耶？”胡序所云，包括两种意思：一是《目录》有年表作用，二是《目录》有正历作用。至于《目录》中的正文，就是简明的“事纲”。司马光在《目录·自序》中说：“叙事之体，太简则首尾不可得而详；太烦则义理汨没而难知。今撮新书精要之语散于其间，以为《目录》”。这几句话，可以说明“事纲”的用意，等于替读者做提要。他不但每事有提要，并且“多采君臣善言”（钱大昕语，见《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这又扩大了年表的内容了。

第三部书是《通鉴举要历》。这部书胡序不曾说到，朱熹在《通鉴纲目·自序》上说：“温公通鉴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语，别为《目录》三十卷，晚病本书太详，《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八十卷以适愿中”。这部书久已失传，但我们可以知道，这是比《目录》稍详的《通鉴》节本。《通鉴》成于元丰七年，在元丰四年时，他已经得了语涩疾，力疾成书后，其次年就做了门下侍郎，以后又做宰相八个月而死。就在这几年中间，他居然又写出这部《举要历》来，无疑是为责任感所驱使的。这书宋人俞成在所著《萤窗丛说》中曾说到，可见并不是未成的书。

元朝王若虚也曾见过这个自节的本子，详见所著《滹南遗老集》诸史辨惑中。

总之，看到上面三颗“卫星”，我们不能不推服司马光的功力卓绝，而范祖禹代撰的进书表文中所谓“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编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隐，校计毫厘”，以及“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是司马光的工作写实，而绝非奏牍上虚滥的盈辞了。

四

至于司马光这部书有缺点，这也是肯定的。但是就这个编年巨著的重要性说，《通鉴》的优点大于缺点。

何以说司马光的书有缺点？司马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浸润儒家思想至深，这思想是偏于保守的。在他的全集里有一篇《铁界方铭》，铭辞是“质重精刚，端平直方。进退无私，法度攸资。燥湿不渝，寒暑不殊。立身行道，是则是效。”（文集卷六十八）这并不是赞的铁界方，实在是自赞。他的为人就是一个铁界方。以一个又板又硬的铁界方的态度写《通鉴》，毫无疑问，是要受着“史以翼经”的传统思想的支配而行事的。试看《通鉴》的第一篇“臣光曰”，就是十足的维护礼教，强调天秩天叙不可逾越的名分论。而全书主要内容，即以神宗赐序所列举者而言，也不外乎“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体咎庶徵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効，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

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诸大端，这些都是为君主打算盘，讲道理，阶级立场是显然的。至于和君主有绝大依存关系的阀阅之家，以唐为例，如郭子仪、柳仲郢、李景让等人，《通鉴》不独书其政绩，也叙述他们的家风和母教，占了一定的篇幅。这些正是司马光从心灵深处自然流露出的阶级感情，所以不觉津津乐道。甚至肖至忠谄附太平公主，《通鉴》也特载他的妹夫蒋钦绪为他叹息的话：“九代卿族，一举灭之，可哀也哉！”究之这些话与“资治”何关，也无非是写给封建贵族看看，垂为鉴戒而已。在当时，司马光诚然也不可能在思想上没有这些特征，但在今天志在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青年们读到这些地方，就觉得司马光为封建君主及其伙计们的计划太周，反映人民的愿望太少，不够做一个卓越有特见的进步史家。因此，我们应该肯定《通鉴》有很大的缺点。

不过我们还可以这样说，《通鉴》尽管有缺点，但并不影响这部书的巨大价值。我们不能用反历史主义的观点去要求古人。这部书，到底还是一部非常有用的史部要籍，对帮助我们今天瞭解当时的政治、社会的实际情况是有用的。汉朝只有一个司马迁，做通古今为一的纪传体的创始人，宋朝也只有一个司马光，做通古今为一的编年体的创始人。纪传以人为纲，一事起讫，分见于不同的纪传中，在未有《通鉴》之前，展转翻查，多么费事？设有异同，从何折中？正史如树，野史如林，要想逐一取来比较，逐一讨论他们的得失，试问那一家的书橱能有那样的

繁富而充实？司马光既有抱负，又有能力；既有能力，又有凭藉；既有凭藉，又有闲功夫。这四种成书的条件，实在比司马迁更优越。所以《通鉴》取材宏富，事实详核，读者既容易看出一件事经历时间的远近前后，又能瞭然现场全貌，包括周遭情势，彼我得失，以及不同人物对这件事的不同议论。就这些特点说，《通鉴》实在比正史更有用。正史所存史料，当然还有很多，但关系治乱兴衰的史事，可算已被司马光搜采殆尽了。清末目录学家缪荃孙为张之洞写《轺轩语》告诫四川士子，也说：“史学须渐次为之，亦须穷年累月，若欲通知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这“历朝大势”正是历史的骨干，是读史者首先要知道的东西。所以去年古籍刊行社特请专家标点《资治通鉴》，以利后学。附入的除了胡三省注而外，又将长洲章钰氏的《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择要附注在正文之下。这样，把极详审的注释，极精细的校勘，合在一部书里，向好学的青年们推荐，的确是旧时代不曾有过的事，也是一件切合当前需要的事。因此，缺点虽是缺点，但它里面的史事，都是通过考异的过程才写下来，虽或有所偏重，可是对材料本身绝无歪曲；至于所附论断，我们不必深究，我们可以把全书正文看做是司马光提出了一千多年积压下来的大小案件让人们再行审核。是非究竟如何？每一个读者都有推究和判断的自由。

我常这样想，古来以修史为终身事业，又能确有贡献的人，汉朝也只有一个司马迁，宋朝也只有一个司马光，其余大都是有志未逮或是偶一为之。司马光虽竭尽全力修成

亘古未有的《资治通鉴》，但他还是孜孜不怠，继续写成《通鉴目录》、《通鉴考异》、《通鉴举要历》这三种书，辅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通鉴》，这些话上面已谈过了。至于周威烈二十三年以前，周世宗显德六年以后，不在《资治通鉴》范围内的事，在一部大书既经脱手的人，似乎很可以置之不顾。但是，司马光一息尚存，他还是不肯住手的。试看《历年图》七卷始于共和，就知道司马光的眼光已注意到威烈戊寅以前；再看他又有《百官公卿表》十卷叙列宋朝官制，就知道司马光也留心于当代史事的整理。果然，到元祐元年，他又奏上最终的一部书《稽古录》二十卷，上起伏羲，下迄英宗治平四年。还不止此，他身后遗书中还有和长编同其性质的《涑水记闻》十六卷，自太祖至神宗，存留史事共四百二十七条。像这样的忠于所学，死而后已，古今怕难找到第二个人吧！就这些好的品质说，司马光应该称得起历史工作者中的模范人物。

以上就是我在本书问世后十年间，经过再认识的过程所得来的一点有关《资治通鉴》及其作者司马光的主观评价。

五

至于《通鉴学》这本肤浅小书，由于我在目前业务上挤不出多少时间，无法进行整个的修改，只能改动一些必须改动的字句。在这篇《自序》中，也曾说到一些基本问题，照主观的愿望，总想藉此让有志读史的青年们进一步阅读《资治通鉴》本书，即以《通鉴目录》权充复习时的